

后发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 重构中的弯道超车^{*}

——历史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余 振 崔 洁

【内容摘要】 全球产业链重构为后发经济体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有利于其充分发挥自身的后发优势，实现本土产业链的长足发展。纵观全球产业链发展史，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比较优势变化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驱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主要机制。到目前为止，全球产业链共经历了五次重构，依次伴随着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等相应时期后发经济体的崛起。通过研究驱动机制和后发经济体案例，本文发现后发经济体在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时，需重点关注核心技术、需求市场以及国际经贸规则等方面，从而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基于此，中国应借鉴后发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弯道超车经验，抓住目前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新发展机遇，不断推动技术进步以促进产业链升级，不断扩大内需以保障产业链安全，还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规则重构，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中国方案。

【关键词】 后发经济体 全球产业链重构 弯道超车 技术创新 历史经验

【作者简介】 余振，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教授（武汉 邮编：430000）；崔洁，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研究助理（武汉 邮编：430000）

【中图分类号】 F1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4)04-0021-16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404002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研究专项“全球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国际合作：中国参与战略及对策研究”（20VYJ03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兼顾效率和安全的前提下，全球产业链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逐步朝着本土化、区域化和多极化的方向重构。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比较优势变化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也会不断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进程，而且不同时期的后发经济体均会受到上述因素的差异性影响，进而形成了特定时期的全球产业链格局。同时，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发展趋势也为后发经济体产业链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既有利于激发其自主创新活力，又有利于促进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还有利于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掌握更多主动权，进而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因此，基于驱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主要机制，分析和总结后发经济体实现弯道超车的案例和经验，对于当前中国如何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实现本土产业链的持续发展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据此，本文将重点探讨下述四个问题：一是探讨驱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主要机制，二是分析后发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弯道超车案例，三是总结后发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弯道超车经验，四是分析上述经验对中国参与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启示。

一、驱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主要机制

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国际形势不确定性的增加，全球产业链正处于加速重构阶段。纵观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史，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比较优势变化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均是驱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主要机制。

（一）颠覆性技术创新是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基础

作为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基础，颠覆性技术创新不仅有利于淘汰生产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的原有产业链，而且有利于催生新的产业链并使其不断发展壮大。前三次工业革命不仅推动了纺织、石油、钢铁、铁路、汽车等重要支柱产业的陆续诞生，而且为现代全球分工体系和产业链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颠覆性技术的应用及扩散会推动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的梯度转移，跨国公司也会进一步加快全球产业链的重构速度。此外，世界各国的技术差距不断拉大，率先掌握颠覆性技术的发达经济体会为了获取更高的

利润以及占据全球科技竞争的制高点，选择保留先进制造业而将中低端技术产业逐步外移。

历次工业革命均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技术的应用。只有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才会促进全球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不断推动全球产业链的重构。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提出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不管是“创新”还是“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新机器、新工厂、新管理方式、新组织形式均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进而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① 工业革命既是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重要发力点，也是助力技术创新持续发展的主要推手。颠覆性技术创新是工业革命的先声，蒸汽机、内燃机和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分别是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产业链的整体布局，推动了工业的全球化发展。颠覆性技术创新会随着技术应用范围的扩大而受到更多关注，此后就会进入爆发式的扩散阶段，不断推动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的梯度转移。著名学者埃弗里特·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认为，创新是一种新颖的思想、实践或事物，采用者也认为创新是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和新方案，而创新扩散则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是大多数个体对新思想的主观感受和交流过程，只有通过社会交流，创新的意义才会逐渐显现出来。^② 颠覆性技术的应用与扩散会经历认知、说服、决策、实施和确认五个阶段，不同阶段的创新采纳者有所不同，而且跨国公司也会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出口技术来加快技术的转移速度，进而加快全球产业链的重构进程。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科技水平也存在极大差距。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往往会发生在技术先进的经济体，而享有领先优势的经济体可以选择出口先进技术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到后发经济体，进而推动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的梯度转移。经济学家迈克尔·波斯纳（Michael V. Posner）认为，技术转移的必要条件是技术差距。技术总是从中心发达国家转移到边缘发展中国家

^①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pp.61-116.

^② Everett M. Rogers,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5th ed., New York: Free Press, 2003, pp.19-25.

家，这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研发新产品和新技术的能力较强，将不断拉大各国之间的技术差距，从而在某些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①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是以技术差距为基础。颠覆性的技术创新一旦发生，技术先进国家就会凭借领先的技术优势，将相关技术或产品出口到技术模仿国家；后者则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来提升本国技术，进而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持续发展。

（二）比较优势变化是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动力

随着全球生产分工模式的建立，世界各国可以根据比较优势差异进行产业间分工，以提升生产效率、获取更高的利润，促进国际贸易迅速发展，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也随之产生，进而推动了全球产业链的重构进程。然而，国际分工模式所带来的贸易依赖却使得产业安全成为国家间冲突的重要根源。为了保障国家产业安全和顺应产业发展规律，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将进一步深化，从产业间分工转变为产业内分工，发达经济体也开始走上对内产业重组、对外产业转移的道路。最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为全球产业链重构带来了新机遇，不断促进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便利化流动，国际贸易蓬勃发展，国际分工模式也会根据产品生命周期变化而转变为产品内分工。

全球生产分工模式的形成源于国家间比较优势的差异，即一国生产不同产品的机会成本不同，从而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全球生产分工格局开始显现，推动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认为，各国会重点生产和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存在比较劣势的产品，促进了分工的专业化和生产效率的提高。^②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了国际贸易和分工的重要性，发达经济体将凭借先进的生产技术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后发经济体则可以凭借低廉的生产成本和劳动力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这不仅有利于推动全球产业链的重构进程，而且有利于世界各国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为了顺应全球产业发展规律，发达国家会将比较优势逐步丧失的劳动密集型、能源密集型等产业转移至其他国家，发展中国家则会承接来自发

^① Michael V. Posne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13, No. 3, 1961, pp. 323-341, <https://doi.org/10.1093/oxfordjournals.oep.a040877>.

^② Davi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46-185.

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还将为其提供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业品，从而在全球产业链的重构进程中使产业内分工渐渐替代了产业间分工。正如著名学者赤松要（Kaname Akamatsu）提出的“雁行模式”，其主要阐述了产业发展规律，即产业一般从经济较发达地区向较落后地区转移，同一地区的产业也会由劳动密集型升级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①

为了实现全球资源的充分利用，跨国公司选择将产品生产的不同工序和环节分散在不同地区，将产业转移从产业层面深入到产品层面，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产业链的重构进程。经济学家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认为，产品会经历进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发达国家为了适应产品生命周期变化而选择将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规避某些产品在产品生命周期变化中的制造劣势。^② 为了获取竞争优势，跨国公司会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优资源配置的生产策略，进而形成全球化的产品生产网络，还会根据全球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禀赋优势，将各种产品生产环节与最合适的地点相匹配并组织生产。这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进而通过产品内分工来推动全球产业链的重构进程。

（三）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推手

随着国际政治力量的分化重组和国际问题的日趋复杂化，全球治理体系迫切需要进行变革。世界各国都希望建立起适合本国发展的规则体系，同时也高度重视国家的安全需求，力争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掌握主导权，以保障本土产业链安全。各国还会积极参与世界秩序重建，进一步引领全球产业链朝着本土化、区域化和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此外，国家间的利益角逐也是影响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因素。愈演愈烈的地缘政治冲突和大国竞争对全球产业链的发展造成了极大威胁，而产业转移正是缓解这一问题的有效政策手段之一。

目前，大国竞争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竞争优势，还会涉及国家安全。为了

^① Kaname Akamatsu, "Historic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eveloping Economies*, Vol. 1, No. 1, 1962, pp. 3-25, <https://doi.org/10.1111/j.1746-1049.1962.tb01020.x>.

^② Raymond Vern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Pittsburgh: Academic Press, 1992, pp. 415-435.

应对来自美西方等发达经济体的安全威胁，新兴经济体会综合考虑竞争优势和国家安全，有针对性地调整产业转移的相关政策，进而推动全球产业链的重构。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将竞争优势理论和产业区域理论相结合，认为产业集群可以帮助一个国家提高生产效率，激发创新研发，从而获得有利的国际竞争优势。^① 因此，后发经济体可以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发展机遇，通过产业转移政策来培育和发展自身所需的要素禀赋，进而形成自身的竞争优势。

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加速演变推动了国际秩序的重建，中国、印度等金砖国家迅速发展，美国的霸权主义难以为继，全球产业链重构逐渐呈现出本土化、区域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大国间的博弈模式正转变为“零和博弈”，并出现“负和博弈”端倪。这种博弈关系也会引发国家间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军事和经济等多方面的较量。^② 源于利益角逐，大国之间在产业链方面的博弈愈演愈烈。大国竞争也开始成为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关键因素，而产业转移也开始演变为国家间进行科技和产业竞争的重要政策手段之一。

二、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弯道超车案例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全球共经历了五次大规模的产业链重构，历次重构均受到技术革新和生产成本等因素的影响。三次工业革命主要引领了前两次产业链重构，而后三次产业链重构则具有从成本偏高地区向成本偏低地区梯度转移的特点。同时，全球产业链重构还往往伴随着大国竞争和国际秩序重建，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息息相关，而且大国博弈下的战略布局也会对全球产业链的结构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③、中国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经济体既是各次产业链重构中的参与者，也是产业转移的受益者，并凭借相应的后发优势实现了弯道超车。

① Michael E. Port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rch-April, 1990, <https://hbr.org/1990/03/the-competitive-advantage-of-nations>.

② 高程：《西方大国推行“负和博弈”下的国际秩序变革》，《人民论坛》2024 年第 5 期，第 82—86 页。

③ “亚洲四小龙”是指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

（一）第一次产业链重构：美国制造业崛起

18 世纪 60 年代，在英国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起因于棉纺织业的创新，引领了从传统手工业向机械化大规模生产的转变。蒸汽机、纺织机械等的发明创新推动了英国工业生产规模的快速增长，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促使英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经济霸主。但随着国内工业产能日趋饱和、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以及运输技术的改善，英国开始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拓展海外市场，进行产业转移。自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英国已逐步将工业革命的成果输出到美国以及欧洲大陆的法国和德国，由此拉开了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序幕。

19 世纪 60 年代，美国主导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生产和资本的进一步集中，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凭借远比英国辽阔的领土面积、更加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以及相对宽松和优惠的经济政策，美国成功吸引了大量的英企投资，不断提高自身的工业化水平，推动了本土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在 1870 年至 1910 年期间，美国占全球制造业的份额从 23% 上升至 35%，而英国则从 32% 下降至 14%。^① 因此，美国成为英国本次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和最大受益国。在全球首次产业链重构中，美国抓住机遇迅速发展，成为继英国之后的第二个“世界工厂”，也为其日后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经济霸主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第二次产业链重构：日本经济复苏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于美国，颠覆性的技术创新不仅加速了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历史性变革，而且促进了生产力的显著提高。然而，美国工业正面临着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问题，于是从 20 世纪中期开始美国逐渐将钢铁、纺织等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日本和德国，由此引发了全球产业链的第二次重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了加强在欧洲的影响力和地位，进一步遏制苏联在欧洲地区的扩张，制定了向战后受到冲击的西欧各国提供经济援助的

^① McKinsey & Company, “Delivering the U.S. Manufacturing Renaissance,” August 29, 2022, <https://www.mckinsey.com/capabilities/operations/our-insights/delivering-the-us-manufacturing-renaissance>.

“马歇尔计划”，以帮助欧洲国家修复和重建战后受损的基础设施，扶持当地经济发展。经历冷战和朝鲜战争之后，美国迫切需要在远东地区寻找一个安全可靠的合适盟友来抗衡苏联和中国，而战后的日本百废待兴，国内也正在进行社会改革以消除生产壁垒。因此，美国开始向日本提供经济援助并实施重建计划，这不仅缓解了日本资源短缺的问题，还为其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不断促进当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日本和德国能成为美国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的原因是两国均具有坚实的工业化基础，而且在人才储备方面基础很好。虽然战争摧毁了日本和德国的物质基础设施，但是此前积累的人力资源和工业技术却得以保存，这有助于两国迅速从战争创伤中恢复并实现快速发展。在二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里，日本经济以年均 8% 的速度增长，到 1968 年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①

（三）第三次产业链重构：“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奇迹

在全球产业链第二次重构之后，日本同样也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 and 升级、劳动力成本上升、市场饱和、竞争加剧等问题。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跻身制造业大国的日本为了应对石油危机和日元汇率升值，开始进行对外投资、调整国内产业结构，选择将半导体、机械、化工、汽车等中高端制造业作为国内经济支柱，而将以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为主的大部分低端产业转移至东南亚地区，由此带动了全球产业链的第三次重构。

这次产业链重构为东南亚地区吸引了来自全球范围的大量资本，促使东南亚形成了具有规模化优势的产业结构，极大带动了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奇迹。20 世纪 70 年代初，拥有人口红利的“亚洲四小龙”率先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利用内部的廉价劳动力去承接来自日本的产业转移。此后，第二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加速了日本的产业转移，“亚洲四小龙”凭借广阔的海外市场、相对较低的关税和生产成本，开始承接资源密集型的钢铁、化工和造船等产业。1980 年，“亚洲四小龙”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占比得到明显提升。

^① [日]池田信夫：《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胡文静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6—37 页。

（四）第四次产业链重构：中国制造业快速发展

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格局由两极角力转变为多极化发展，世界经济迈入了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国际贸易和投资也更加自由化和便利化，这也为全球化产业链重构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得益于产业转移对经济的刺激，“亚洲四小龙”的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升，劳动力成本也随之提高，还面临着局部市场饱和与产能不断扩张的矛盾。因此，从1990年开始，“亚洲四小龙”选择将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以及技术含量较低的相关产业逐步转向一些发展中国家。

与前三次不同，第四次产业链重构是产品或产业的某一生产环节或工序的转移，不再是整体产品产业链的转移，而中国则成为全球第四次产业链重构的主要受益国。作为这次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后发经济体，中国既有低廉的用工成本、高效的生产率、充足的技术人才等生产优势，又有政治环境稳定、产业体系较为完备、税收相对优惠的制度优势。同时，通过自身的比较优势，中国快速融入世界分工体系之中，利用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顺利发展成为“世界工厂”。1990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为0.61万亿元，2000年达到3.19万亿元，十年间平均增长率为17.98%；而201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增至13.03万亿元，2000年到2010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5.12%。^①

（五）第五次产业链重构：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经济崛起

近年来，国际体系和各国力量对比逐渐出现东升西降的趋势。自第五次全球产业链重构以来，一大批新兴经济体相继崛起，世界的力量重心首次向非西方世界转移，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正在加速形成。值得注意的是，第五次产业链重构与前四次出现了明显的不同，原因在于非经济因素如中美贸易摩擦、地缘政治冲突等的影响，突出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等欠发达地区转移，部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则回流到美欧等发达经济体。

在全球产业链的第五次重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正逐步向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后发经济体转移，这是因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技术创新和高端制造业的主要参与者，但随着国内生产成本提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

^① 李金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制造业发展格局》，《东南学术》2018年第4期，第69页。

也会加速将低端产业向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后发经济体转移。作为这类后发经济体的代表，越南地理位置相对优越，政治体制较为稳定，还具备了相对丰富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资源，为其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的双重保障，也为承接产业转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近年来，越南已经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中心之一，2020 年其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已经达到 23.95%，且呈现出持续的增长势头。^①

三、后发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弯道超车经验

基于驱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主要机制，再通过分析后发经济体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弯道超车案例，可以发现：核心技术、需求市场以及国际经贸规则是影响后发经济体能否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机会实现弯道超车的关键因素。首先，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发达经济体有机会掌握最先进的核心技术，为了不断获取垄断利润和占领全球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其相继将中低端技术产业向外转移，这有利于帮助后发经济体掌握先进技术，为其自身的产业链升级提供新机遇。其次，承接产业转移的后发经济体往往正处于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市场需求迅速增长，消费市场日益广阔，有利于增强本土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性。最后，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重构通常伴随着国际竞争，因而国际经贸规则也会对后发经济体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产生重大影响。

（一）摆脱核心技术依赖

在全球第二次产业链重构中，日本顺利承接了源自美国的半导体产业转移，促进了本土产业的迅速发展，还通过研发创新来摆脱核心技术依赖，最终成功超越美国占领产业高地。

第一，日本抓住美国实施技术转让的机遇，积极引入先进技术，还努力争取半导体产业的相关技术授权，不断推动本土半导体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① 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参见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reports.aspx?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例如，日本东京通信工业株式会社（索尼公司前身）在 1953 年从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引进晶体管技术，生产出第一台收音机，引来了模仿者的纷纷追随；1963 年，日本电气株式会社（NEC）从美国仙童半导体公司获得平面光刻工艺授权，这意味着日本能够生产集成电路；随后，卡西欧也发布了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子计算器，这意味着日本半导体产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第二，不同于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工业应用方向，日本选择进入半导体产业的民用市场，重点关注民用电子产品的技术研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与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例如，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是大型机的鼎盛时期，大型机的主要客户是对质量和稳定性有较高要求的企业，因而日本将产品使用寿命提升到 25 年，其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产品在性能和品质上都超越了美国，还因物美价廉而受到广泛欢迎。1982 年，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 DRAM 供应国，1986 年日本的 DRAM 占全球市场的份额已经达到 80%。此外，日本半导体产业占全球的市场份额从 1980 年的 26% 上升到 1986 年的 44%，而同期美国所占市场份额则从 61% 下降到 43%。^①

第三，为了尽快摆脱对美国的技术依赖，日本政府开始持续出台相关的产业政策来扶持半导体产业的研发创新，帮助日本企业在核心技术上攻坚克难，逐步建立起足以抗衡美国的产业凝聚力。例如，1976 年至 1979 年，日本通产省联合富士通、日立、三菱、NEC、东芝等大公司，以及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的电子研究所、计算机研究所，汇集全部资源优势，合作攻克核心技术难题，共同实施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项目（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 VLSI），旨在整合日本半导体人才资源，消除企业壁垒，通过合作来帮助企业解决关键问题，改进日本半导体芯片生产工艺，以全国之力激励 DRAM 的研发创新；1976 年以后，日本 DRAM 技术的发展速度比美国快得多，在 1982 年美国刚刚开发出 256K 的 DRAM 时，富士通和日立公司已将其批量推向市场，技术研发领先美国 2 年左右。^②

① [日]西村吉雄：《日本电子产业兴衰录》，侯秀娟译，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79—105 页。

② Martin Fransman, *The Market and Beyond: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 Japanese Syst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14-115.

（二）重视需求市场变化

需求侧的消费市场变化是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进程的重要前提。在全球第三次产业链重构中，韩国对需求市场变化的敏感度较高，及时抓住了个人计算机（PC）市场的崛起机遇，快速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率先开始组织规模化生产，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顺利承接了来自日本的半导体产业转移。

第一，韩国率先注意到需求侧的消费市场变化，及时抓住 PC 市场崛起的发展机遇，迅速将研发对象从以企业为主的客户转向个人消费者，研发需求也从品质和可靠性方面的高要求转变为低廉的价格。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 PC 市场的兴起，以企业为主的客户结构逐渐被打破，个人消费者的份额开始增加，消费市场结构的变化导致需求从高可靠性转向低价。韩国紧抓这一发展机遇，率先开始规模化生产，成功超越日本成为全球半导体市场的后起之秀。

第二，随着需求市场的关键竞争因素发生改变，韩国为了增加在全球市场中的国际竞争力，开始与竞争对手展开激烈的价格战。例如，受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DRAM 价格下跌了 90%，但三星却逆周期地用上年利润的 118% 来扩大产能，与竞争对手展开激烈的价格战，从而直接导致竞争对手德国奇梦达和日本尔必达的陆续破产。^①

第三，韩国对需求市场变化的敏感度较高，能够准确把握最佳的投资机遇，从而推动本土半导体产业的持续发展。例如，2011 年到 2012 年，尽管 PC 对 DRAM 的需求拉动影响减弱，但三星却在 2013 年加大投资，最终在行业复苏之前取得了首发优势，排挤掉了台湾茂德这一竞争对手。

（三）参与国际经贸治理

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不断以及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逐渐上升，致使后发经济体承接产业转移的风险不断增加，也不利于全球产业链重构进程的稳定推进。因此，后发经济体需积极运用和参与制定国际经贸规则，及时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带来的风险，促进本土产业链的持续发展。

^① 于潇宇：《后摩尔时代中国半导体产业创新战略研究——后发经济体典型赶超路径的经验启示》，《中国科技论坛》2022 年第 10 期，第 42—51 页。

第一，自贸区建设是后发经济体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此举利用外资建立出口加工区，成功打造全新的经济开发区模式。例如，二战后，爱尔兰的香农自贸区将地理优势转化为税收优势，从单一的航空服务转向出口加工贸易，大力推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了大量来自美国等先发经济体的投资，促进了本土产业链的持续发展。

第二，后发经济体通过积极参与制定区域贸易协定，来强化成员国或邻近国家之间的合作交流，从而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进程中掌握更多主导权和话语权。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由东盟十国于2012年发起，各参与方根据协议以及自身不同发展程度对规则条款进行了多轮磋商。这更好地兼顾了各方利益，也有利于为各自内部优势产业链在东亚地区的重构提供良好的投资贸易环境，保证本土产业链的持续发展。

第三，为了顺应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后发经济体还会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充分体现其“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特点，促进自身产业链的持续发展。例如，作为金砖合作机制的创始成员国，印度一直主动塑造和引领金砖国家合作议程，积极推动国际格局多极化，不断提升自身的国际话语权，还通过金砖合作机制维持大国战略平衡，确保其始终可以多方受益，持续促进本土产业链的进一步发展。

四、对中国参与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启示

全球产业链重构正呈现出本土化、区域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对中国本土产业链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全球产业链的历次重构中，后发经济体通常会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广阔的需求市场，快速而顺利地承接来自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移。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的重构趋势也会对应后发经济体产业链的发展形成倒逼作用，不断推动国内产业链的转型升级。创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支撑起研发设计、制造以及工程服务等产业链，不断维系着国家的支柱产业和制造业竞争力。在技术驱动因素的影响下，全球产业链重构路径并非单向的。一方面，为了获取更多垄断利润和占领全球技术

竞争制高点，掌握核心技术的先进经济体选择将中低端产业转移至后发经济体。另一方面，为了遏制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扩散，发达经济体以国家安全为由，不断推动先进制造业的相关产业链回流本土。目前，国内中小企业虽然数量众多，但对经济环境较为敏感、抗风险能力较低，进而导致中国产业链的断裂风险较高，而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进程缓慢，中国尚未完成市场规则体系的统一，仍需进一步消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加快消除阻碍市场融合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此外，为了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占据先机，世界各国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规则的重构，相继出台相关政策以提高自身产业链的自主性，进一步强化了投资、贸易的区域化和本土化，推动了全球产业链重构步伐。但中国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话语权偏弱，对国际经贸规则的运用还不够熟练，参与的区域贸易协定水平有待提升，在缔约对象、规则深度以及开放力度等方面也有待进一步提升。基于上述背景，中国需抢抓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新发展机遇，通过技术进步来驱动产业链升级，通过扩大内需来保障产业链安全，还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规则重构，从而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弯道超车。

（一）技术进步驱动产业链升级

随着信息技术、芯片、生物医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全球竞争日趋激烈，技术进步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在产业基础与技术方面，中国仍面临着较大的国际竞争压力。技术进步是驱动产业链升级的必要条件，中国需尽快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在关键技术、先进技术和核心技术等方面实现较大突破，有效降低他国技术封锁对中国产业链升级所造成的威胁。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建立健全技术创新体系，完善研发创新方面的政策制度，驱动国内产业链的转型升级。积极推行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健全重点科技创新领域的战略支撑，切实加大关键研究的要素投入，提高原始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催生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推动国内产业链的转型升级进程。

第二，构建和完善产业创新体系，调动产业链上中下游主要企业联合体

的积极性，促进技术链和产业链的协同发展。重点关注市场和企业主体的具体需求，针对性地培育一批拥有国际领先技术的龙头企业，切实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依靠持续创新行动和实效带动配套企业的协同创新，还需以全球视角来规划技术创新，建立国际创新合作机制，着力引进国内外知名的行业创新头部企业，培育若干世界级创新型产业集群。

第三，加大技术研发的扶持力度，为企业提供充分的资金、人才以及研究基地等资源要素，推动人才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聚焦高层次人才积累和创新活力激发，促进人才与优质项目、优势产业的深度融合，系统性地发现有人才资源，深化院校合作、校企合作，加强企业、人才、项目、平台的一体化联动，还需不断完善科研人才的引进机制，推动科研人才的管理体制改革，充分调动本土产业人才的积极性，驱动产业链升级。

（二）扩大内需保障产业链安全

在外部环境不可控因素日益增加的国际背景下，全球市场需求进入低迷期，中国要保障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性。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建立健全内需体系，充分发挥国内大市场优势，提高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匹配程度，保障本土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着力提升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以高质量供给刺激新需求、创造新消费；还应基于国家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重点发展技术装备和高端仪器设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满足国家的重要需求。

第二，明确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推动区域间的产业链合作，充分利用产业链优势，不断优化区域间的产业链布局，保障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性。持续推进超大城市功能疏解，培育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联合发展的都市圈体系，以建立有序合理的产业分工，还需积极打造对内开放的新高地，增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发展的能力，推动地区间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

第三，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通过开放合作来联通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持续保障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性。促进内需主导的经济发展，积极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实现生产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不断强化国内循环的内生动力，加大吸引和

利用外资力度，强化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保障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性。

（三）参与全球治理规则的重构

为了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这一重大历史机遇，中国需努力争取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主导权，增加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还需积极参与高水平的区域贸易协定和经济合作机制，与区域合作机制的成员方展开深度合作，推动产业链的持续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持续推动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以自贸试验区为抓手，加快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努力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结合自贸区自身产业和区位优势，主动对接国际贸易新规则，率先形成可复制的制度型开放经验，还需根据合作国家市场成熟程度和规则实践水平的不同，制定多元化和差异化的合作方案，充分发挥自贸区在国际规则制定和对接上的先行先试作用。

第二，积极参与区域贸易协定，推动中国尽快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之中。仔细研究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成果重点，积极与各方展开对话交流，以便及时调整国家的相关策略以满足各方的关切和期望，以双边贸易协定为基石，不断寻求与各成员国的共同利益，推动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合作，还需对标现有规则与区域贸易协定的差异条款，推动相关领域的制度改革，缩小其与贸易协定之间的差距，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

第三，积极利用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通过创设和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持续扩大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经济治理的广度和力度，完成从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向贡献者、引领者的身份和地位转变；还需积极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注入新动力，也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中国方案。

[责任编辑：张 珺]